

走到无路可走时该怎么办？
阮籍曾经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演绎这种无路的痛苦：“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

穷途恸哭，是对走错道路的悔恨，也是因无路可走而感到的绝望。错误的选择一定意味着“错误”的结局吗？悲观主义者的答案是肯定的。比如战国时著名的道家学者杨朱，《荀子·王霸篇》记载他：

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颦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

“颦”即“跬”，跬步，半步也。“跌”是差失之意。杨朱站在四通八达的路口，想象着自己选择了错误的方向，踏上了最初的半步，接着一步错，步步错，最终“谬以千里”，便忍不住痛哭起来。
为无法做出的选择与尚未犯下的错误哭泣，也算智者的行为了吧。通常的人们，只能追悔已然。阮籍《咏怀》其五，所写就是这种无尽的悔恨：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

这首诗的主旨，或以为讽刺他人，或以为自悔失身，似以后者为胜。元人刘履在《选诗补注》中说：“此嗣宗自悔其失身也。言少时轻薄而好游乐，朋价相与，未及终极而白日已暮，乃欲驱马来归，而资费既尽，无如之何。以喻初不自重，不审时而从仕。服事未几，魏室将亡，虽欲退休而无计，故篇末托言太行失路，以喻慨叹无穷之悔焉。”这个解说虽然不够深入，但大体贴着字面，可以接受。

诗歌有些词句需要稍作解说。第四句“赵李相经过”，是说跟“赵李”相来往。结合上下文看，这个来往即一起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所以“赵李”应该是

指京城贵势者、贵游子。前人争论这个“赵李”字面上究竟指谁，提出李斯、赵高、赵飞燕、李夫人、赵李外戚家族，宽臣赵谈、李延年，游侠赵季、李款诸说，或者与上下文不合，或者全无典籍，强行捏合，都难使人信服。各类词典也据此设立义项，多滋谬误。实际这句话是有明确的出典的，《汉书·叙传》记载汉成帝时，“自大将军薨后，富平、定陵侯张放、淳于长等始爱幸，出为微行，行则同輿执轡；人侍禁中，设宴饮之会，及赵、李诸侍中皆引满举白，谈笑大噉”。所以“赵李”在《汉书》中指皇帝身边的亲信重臣，对应到阮籍时代，就是正始年间的侍中尚书何晏、散骑常侍夏侯玄诸人。何、夏侯诸人既是高官贵戚，又是彼时玄学风潮的中心人物，且以“浮华”著称，完全对得上《汉书》中的“赵李诸侍中”。正始年间，阮籍曾写有《乐论》一篇，夏侯玄则撰作《辨乐论》与之讨论。彼时朋友间互相质疑辩论，是盛行的风气。

第八句的“三河”是对河南、河东、河内地区的合称。阮籍的家乡陈留郡正属河南。《咏怀》其十三写到“苏子狭三河”，从前的苏秦也觉得河南家乡狭窄，要去天下实现自己的抱负，最终被忌恨者刺死。我们的诗人离去又归来，望一望这个当初觉得狭小的故乡，是喜还是悲？

第九、第十两句是倒装句法。曾经觉得自己的钱财多得根本花不完，没想到转眼间“百镒”黄金都耗尽了。

最后两句则是著名的南辕北辙的故事。《战国策·魏策》载季梁对魏王说：“今

者臣来，见人于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虽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虽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数者逾善，而离楚逾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欲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逾数，而离王逾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

这样，全诗的意思可以得到贯通的理解。诗歌抒情主人公曾经有三重倚恃：青春年华、万贯家资、权贵关系。他大概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想的只是纵情肆意而已，本以为有三重倚恃在，自可以弦歌到地老天荒。不想转眼长日已尽，青春与富贵皆一笔勾销。落魄归来，还望故乡，是什么心情？忽然领悟，一早便已迷途，自以为的倚恃越多，行路越远，到最后猛然回头，才发现已经没有力量，更没有可能往回走。竟然完全错了，无法悔改地错。这一生将就此错失了吧，除了承受这份痛苦，别无其他可能。人生到此，夫复何言！这就是“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所蕴含的惊心动魄。

小过易纠，大错难挽。君子日日省思已过，再加上师友的切磋琢磨，为的是过而能改，而不至于转成大错。这番道理懂得的人不少，有几个做得到？聪明如阮籍，也悔之晚矣。他锋芒早露，与何晏、夏侯玄一帮名士交游，早早成为名动天下的人物。等到司马氏父子开启了篡权易代的进程，何晏、夏侯玄都被族诛，剩下寥寥几个名士，一举一动都为天下

人瞩目，连现实中辞官隐居也会被视为有意对抗，何况其余。彼时的阮籍该何等羡慕置身事外的无名之辈。一旦身入局中，还幻想全身而退，岂不是“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阮籍一定觉得自己当愚不愚，才是不智和大愚。

真的是阮籍太愚吗？“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王安石《凤凰山》》）谁不愿意这样过一生呢？少年阮籍身当太平，满以为繁华长久，不正是准备这样过一生吗？怎么忽然间就白日蹉跎，长夜已至。从前的对，怎么就成了错，而且还是穷途失路的错？这样的悲剧该怪谁？一开始当然是怪自己，怪自己走错路。可再想又不知道该怪谁，错的似乎还是走路本身，似乎选哪条路都是错，才真是莫可名状之悲。个体在时代面前渺小无助，这才是更大的悲剧。

无关乎选择的穷途，是比选择错误的失路更令人无力和绝望的。
“失路将如何”？这是一个需要直面的问题。
人生已无出路，但生活依旧延续，该如何在了无希望中自处？阮籍给出了两个答案。其一，搞点饮酒任诞的行为艺术；其二，成为一个诗人。
阮嗣宗到后来成为“至慎”的人，开口只有玄远，绝不牵涉现实之分毫。不过压抑的痛苦总要发泄，直接的方法是倾注到怪诞的行为上。这些违背礼法的荒诞举动，在鲁迅先生看来，其实是深爱礼教者的应激反应与抗议行为。他们看不得礼教被谋国篡位的司马氏君臣利用、亵渎，“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此外，越是打心底瞧不起自己的懦弱，就越会任由自己“堕落”。镇日大醉，母亲去世了也要喝酒吃肉，这何尝不是自证不堪和自我折磨？

怪诞行为的背后，分明深藏着恒河沙数的痛苦，不想却后被辈的贵游子弟学了去，成为装点风流的时尚。阮籍无法分辩，也无力反对，只得任由自己躺在井底泥水之中，瞪视那些永不能愈合的伤口，吟唱起一些不成曲调的谣曲。就这样成了诗人。

在写诗暂时还没成为罪状的时代，许多说不出口的咒骂和苦闷都可以加上韵脚写出来。比如刻画伪君子的姿态：“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比如戳破世界无“人”的真相：“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发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以及刻骨的惊悚感：“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眸

怪诞行为的背后，分明深藏着恒河沙数的痛苦，不想却后被辈的贵游子弟学了去，成为装点风流的时尚。阮籍无法分辩，也无力反对，只得任由自己躺在井底泥水之中，瞪视那些永不能愈合的伤口，吟唱起一些不成曲调的谣曲。就这样成了诗人。

在写诗暂时还没成为罪状的时代，许多说不出口的咒骂和苦闷都可以加上韵脚写出来。比如刻画伪君子的姿态：“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比如戳破世界无“人”的真相：“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发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以及刻骨的惊悚感：“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眸



城市骑手（版画）许峰
选自第二十二届“江南之春”美术作品展



注释，作为历次《鲁迅全集》编辑的关键，因所折射的思想观念更迭，人物评价升降，时代风云变幻，不仅专家学者态度慎之又慎，连普通读者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热议，使之成为现象级的文学事件。稍显遗憾的是，提到宋云彬，大家熟知的是他文史学者、出版家、民主人士的身份，对他的首倡之功，迄今却无人提及，笔者特撰小文略作梳理。

1949年10月19日，宋云彬在《光明日报》刊发《纪念鲁迅的一个建议》，率先提出为鲁迅作品做注。摘录如下：

纪念鲁迅，要学习鲁迅。学习鲁迅，总得从读鲁迅的作品入手。

鲁迅的作品可真多，单是小说、杂文，细细读一遍，读到每篇都能够了解，能够体会，怕要化上一年半载的时间吧？

而且要读到每篇都能够了解，能够体会，又是谈何容易。这并不是说鲁迅的文章不容易读。鲁迅的文章很接受口语，没有什么语法上的错误，读起来并不难。只是现在的青年大都不甚了解过去的中国社会的情况，读鲁迅的小说就很难真切了解，更不用说深深的体会了。……时代变了，教育青年人怎样能够一看就了解并且体会鲁迅的作品呢？至于鲁迅的杂文，都是所谓“攻击时弊”的，不知道当时实际情况的人，现在怎么能够看得懂。我敢武断的说，现在的青年朋友都知道鲁迅先生的伟大，都会说学习鲁迅，可是真有兴趣读鲁迅作品的人就不多，真能懂得鲁迅作品的人更不多。

然而鲁迅的作品现在的青年朋友确乎应该认真读一读的。读懂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要比读一部中国现代史之类受用得多，因为鲁迅的全部的小说

和杂文就是一部最生动的现代史。至于读了鲁迅的作品，可以使你懂得怎样认识敌和友，分别爱和憎，怎样努力不懈，奋斗到底，那更不用细说了。
根据上面所说的种种理由，我在纪念鲁迅的今天提出这样一个建议：
“请研究鲁迅的专家们，把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每篇加以详细的注释和讲解。”

这些注释和讲解可以另印专册，每篇但标篇名，不载原文。这样，可以避免侵害版权的嫌疑，而青年们有了这一本书在手头，就容易读懂鲁迅的作品了。

翌年10月7日，出版总署召开座谈会，许广平表示由于经营困难，愿意结束鲁迅出版社工作，将著作版权无偿捐献国家。9日，中宣部为此致函华东局宣传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提出为改善鲁迅著作发行工作，由出版总署接手鲁迅出版社工作，成立鲁迅著作编辑部，还特别说明“鲁迅著作的编校注释工作由冯雪峰专任其事，并调集王士著（上海）、林辰（重庆）、杨霁云（常州）、孙用（杭州）四人协助”，希望两部门配合开展工作。

宋云彬正任职于出版总署，对其间经过自然有所了解，他就此写了《从注

释鲁迅作品说起》，刊发于1950年10月19日的《光明日报》。文章起首就与读者分享了此消息：“最近得到一个很好的消息：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文已经推定专人负责，进行注释的工作，陆续出版注释本。”除了再次申说鲁迅作品需做注外，他还提出要加强对《野草》研究和编撰年谱，“像《野草》那样的作品，我以为必须有‘野草研究’或‘怎样读鲁迅的野草’之类的专书，供青年们参考。这类书不妨由几个人合写，最好事先经过详细的讨论，然后写成文字。除注释鲁迅先生的作品以外，有一桩工作也非立刻动手做不可，那就是编《鲁迅年谱》”。现在看来，这两项提议同样体现了他极高的文学素养与史学眼光。可以说，正是宋云彬在新中国成立初发出的“把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每篇加以详细的注释和讲解”呼吁，引起了各方注意，奠定了鲁迅作品需要注释出版的基调。

有意思的是，宋云彬与鲁迅的相识却始于一场笔仗。1927年初鲁迅离开厦门到达广州，在一段时间的冷眼观察后认为所谓的革命中心并无特别之处。而此时的宋云彬正担任《黄埔日刊》编辑，年轻气盛的他发表了《鲁迅先

生住那里躲》：
“噫嘻！异哉！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的苦痛，新社会生出的苦痛，多多少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视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回复到过去时代去了。噫嘻！奇哉！鲁迅先生躲进了。

他在结尾高呼：
鲁迅先生！广州没有什么“纸冠”给你戴，只希望你不愿做“旁观者”，继续“呐喊”，喊破了沉寂的广州青年界的空气。这也许便是你的使命。如此社会，如此环境，你不负担起你的使命来，你将住那里去躲？

对宋云彬的疑问，鲁迅没有立即回答，反而是许广平写了《鲁迅先生住那些地方躲》代为说明：“他是要找寻敌人的，他是要看见压迫的降临的，他是要抚摩创口的血痕的。”年底，鲁迅发表了《在钟楼上》正式回应，他表示理解宋云彬的出发点：“这是对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恫恫，并非恶意的笑骂的文章。这是我很明白的，记得看见时颇为感动”，

被野草，暮喜亦云已。”总之，人间世界是一个残破丑恶的世界，这里充满残忍、邪恶、虚伪、丑陋、悔恨和痛苦，这里没有坚固，生命与美好都转瞬即逝。
阮籍更喜欢吟唱的，是幻想中的超越：“濯发飏谷滨，远游昆岳峰。登彼列仙阻，采此秋兰芳。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危冠切浮云，长剑出天外。细故何足虑，高度跨一世。非子为我御，逍遥游荒裔。”
与屈原、曹植一样，失路的诗人渴望超乘白云，遨游帝乡。只是屈原执着，处处碰壁，“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天上不异人间。而曹植孝义忠爱，虽感愤遭遇，渴望仙游，却并不质疑人间。

在诗歌中冲决罗网，批判凡俗，而高出一世人，阮籍竟似第一人。这番志意，他再三道及：
一飞冲天青，旷世不再鸣。岂与鶉鶡游，连翩戏中庭。
顾谢西王母，吾将从此逝。岂与蓬庐士，弹蹇诵言誓。
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

清代学者刘熙载曾说：“无路可走，卒归于是有路可走，如庄生所谓‘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大樽，而浮于江湖’，‘今子有大树，何不树之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是也。”（《艺概·文概》）庄子困顿人间，穷愁潦倒，却在精神世界中觅得一无何有之乡，其中尽可以逍遥自在。人间万事，如雁过寒潭，再不放在心上。阮籍做不到庄子的逍遥，但他同样硬生生在无路的大夜中开出一路，那便是成为诗人。不是吟风弄月、润色鸿业的诗人，而是磊砢伤口、向月长嚎的诗人。

诗到屈原，始作生命的洪流，到海方止。诗到阮籍，始为英雄的归路，天地同秋。
少年阮籍，一定是以英雄自居的。“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没有吞吐宇宙的胸胆，写不出这样的诗句。这番志气，迎头撞上玩弄阴谋、“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时代，终成泡影。“阴阳有外错，日月不常融。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潜龙难用，遁世者闷头隐遁，终能由有闷而至无闷，这才是英雄的觉悟与力量。

英雄失路，人诗俱老，凡此辈人物，都是阮籍的苗裔。陶渊明是，杜甫是，苏轼也是。即如渊明采菊，常人只觉其淡，却不知这淡逸是绚烂浓挚的极致。苏轼赞他“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一语破的。黄庭坚则看出其英雄本志：“凄其望诸



葛，抗脏犹汉相。时无益州牧，指挥用诸将。平生本朝心，岁月阅江浪。空余时语工，落笔九天上。”（《宿旧彭泽怀陶令》）他以为渊明本心不异诸葛孔明，命运的差别在遇不遇刘备而已。明初诗人张以宁发挥此意，写得更加明白：“世无刘豫州，隆中老诸葛。所以陶彭泽，归兴不可遏。凌歊燕功臣，旌旗蔽轸轂。一壶从杖藜，独视天壤阔。风吹黄金花，南山在我闕。萧条蓬门秋，稚子候明发。岂知英雄人，有志不得爵。高咏荆柯篇，飒然动毛发。”（《题海陵石仲铭所藏渊明归隐图》）清代诗人舒位复以两句概括之：“仕宦中朝如酒醉，英雄末路以诗传。”（《向读文选诗爱此数家不知其可乎因论其世凡作者十人诗九首》）

“英雄末路以诗传”，不失为古典世界解决“失路将如何”问题的好办法。其中贯彻的是大《易》随时，“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的思想。他们相信的是“无陂不平，无往不复”，当时势不在我一边时，需要做的便是固穷、修身、等待。成为诗人，写作诗歌，既是在无尽等待中消磨时光的方法，也是发泄情性，自我激励的方法。绝大多数人并不会等到使屈者伸、使枉者直的时代，但至少，他们留下了诗歌。古人渴望不朽，其实朽与不朽难以预期，但至少诗歌使不朽成为一种可能。

“英雄末路以诗传”，作为君子固穷的一种方法，在悲观的背后潜藏着一种乐观，相信历史循环、人世往复，相信圣君贤相的时代终会来临，而蕴蓄于诗中的心事终会遇到异代知音，得以大白于天下。

历史真的循环往复吗？现代思想已经不再抱持这种古典的信念。现代诗人也不再渴望在这套循环往复的秩序中获得不朽。相反，清醒而决绝如鲁迅，渴望速朽。

鲁迅也有很强的失路感。在散文诗《影的告别》中，鲁迅说：“有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这是一种深具现代意识的失路感；旧世界是自己所憎恨的，但自身分明源自旧世界，因此注定无法进入新世界。身在新与旧的夹缝之中，好像历史的“中间物”，命运便只能是彷徨，“彷徨于无地”。

“彷徨于无地”，是鲁迅的穷途痛哭。痛哭的结晶也是诗——散文诗集《野草》。一九二七年，鲁迅为《野草》写就《题辞》：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

对死亡与速朽的呼唤，是将自己作为献祭，献给那个六十年一甲子无限循环的历史，希望与之一起毁灭。

“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只是不曾宽恕自己，又何须宽恕他们。循环的历史中，失路的英雄以诗歌作为归路；现代世界里，召唤地火者用诗歌献祭自己，而成为英雄。循环的历史中，失路自我复制，与历史一道循环；现代世界里，失路者希望以自己的绝路造就他的人生路。

这是对“失路将如何”的崭新回答——不接受。不接受必然失路的命运，更不接受制造命运的天罗地网。

大地上强劲生长的野草，对着那看似神圣的、坚固的、环环相扣的、生生不息的庞然大物，放声大笑。

宋云彬：鲁迅作品注释的首倡者

邱雪松

并解释自己在广州放弃写作的缘由，是因为深知“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能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

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宋云彬入职开明书店担任编辑。从后来鲁迅托开明老板章锡琛分送的五本皮脊精装《海上述林》，其中就有宋云彬一本的情况来看，两人未因笔仗交恶，关系不错。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宋云彬应约撰写纪念文章《鲁迅》。他以阶级论的视野从运动变迁和队伍分化的高度综述了作家一生的思想历程，文章在《中学生》刊发后，获得了巨大反响，宋云彬自此开始了对鲁迅的推广。他接连发表《鲁迅的战斗精神及其战略》《怎样读鲁迅遗著》《从学术方面看鲁迅》等数十篇文章；抗战期间宋云彬在文协桂林分会主办的文艺讲习班专门讲授《鲁迅杂文研究》，这是全国最早的鲁迅杂文教学专题课；他为文化供应社编辑的《鲁迅语录》发行量高达两万余册；1940年他还与夏衍、聂绀弩等一道合作创办《野草》，培养出一大批鲁迅风杂文作



宋云彬一九三八年八月摄于武汉

者。除此以外，宋云彬还身体力行写作杂文，他的文章出文入史，笔底藏锋，聂绀弩点评“常常是用心平和、不动声色、轻描淡写，有的甚至是与世无涉的外衣裹着，里面却是火与刺”。
1949年后，除大力提倡注释本外，宋云彬还撰写了《怎么样读鲁迅的著作》《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我们要向鲁迅先生学些什么》《从思想发展看鲁迅》《鲁迅作品给我的启发》《回忆鲁迅在广州》等文章，一以贯之地推介鲁迅。中华书局徐俊先生曾评价宋云彬是“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我相信，在推动鲁迅经典化方面，宋云彬应获相似赞誉！